

大学之大

鸡鸣丛书

沈卫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学之大



鸡鸣丛书

沈卫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大/沈卫威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2

(鸡鸣丛书.第2辑)

ISBN 978-7-02-006723-7

I. 大… II. 沈… III. 东南大学-校史-文集
IV. G649.285.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812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大学之大

Da Xue Zhi Da

沈卫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723-7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董 健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始)、南京高师(1915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始)、南京大学

(1949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戒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

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岌岌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文化的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生、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在此,“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类)倒是不断出现,也

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话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子子说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

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定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宋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宋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

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7年6月22日改定

自序

—

两次到台湾访学，都专门参观、访问了新竹的清华大学。1997年9月第一次访问新竹的清华大学时，朋友专门安排我参观了纪念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梅亭”。编选这本专题文集时，我首先想到梅贻琦的大学理念。于是又重温了他1931年12月3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他说：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

借梅贻琦之义，我将此文集取名《大学之大》。

这本文集的内容主要是谈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取名之后，我因新竹的“清华”，而回想到北京的清华园和颐和园。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后，清华大学在1929年6月为他立了纪念碑，碑铭出自陈寅恪的手笔。我也常到清华园和颐和园，看过王国维的纪念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陈寅恪针对王国维自杀所说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②陈寅恪同时发出了现代大学教授高标的理性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书中选有的两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便是我对王、陈两位梅贻琦所谓的“大师”的仰止。

现代大学的历史,多姿多彩。我阅读过多种校史,有许多知识上的收获。无力也无心去为一个大学写史,更多的是自己的兴趣所致。这里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书写,纯粹是个人的叙事。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果你认真听来,再仔细琢磨,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文学成分。捕风捉影,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是大学故事的“正常现象”,等同于民间故事一样的文学创作。故事的事主,多是文史教授,而书写或讲述故事的人,又多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文史学人(同事、弟子)。这样一来,大学往事中的故事,便成为承载大学传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感性工具。有许多故事,还不成文本,而是在大学校园里口头流传。这样有文本的故事和无文本的传说,共同构成了大学往事中的“故事”。陈平原将关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传说,趣称为机构、教师和学生共同合成的学术史的“神话”^③。我则把这些大学往事中“故事”看成是一个大学的“自传”。

我的前辈师长教授们被“传说”着,我等后生教授在大学内外也正被“传说”。刚刚发生的事,在“传说”中有的就无法证实或证伪。经常有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向我求证某一“传说”,我多含混回答。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学。得不到满意答案的朋友常常反问我:你不是写传记的吗?

执掌北京大学时间最长的蒋梦麟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我个人以为一个大学的知名度实际上是取决于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现有知名教授、现任校长的人格魅力和

能力。

我在本文集中指出,当今专业细化后,我辈所谓教授的传统国学知识的缺失和不足,尤其是在中文系语言学与文学的分野,导致两个专业间知识的差异越来越大。就“两古”而言,“古代汉语”侧重于类似“小学”的语言本身(形、声、义——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学”则侧重文学本身的考据、义理、词章,即所谓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但“考据”也只是局限于文献、典籍,很少涉及“小学”的内容。一个研究文学的教授,轻易不敢谈诗词韵部。王国维、陈寅恪、黄侃都有古音学的专门论著,当今一个文学教授,有几人同时敢碰古音学?这是我们时代的局限,也是我们这些在“革命”年代长大的所谓教授在大师面前的知识短缺。有人对我的说辞表示异议,说我们现在的学者有外语和现代科学新知的优势。我说,我们有谁敢和王国维、陈寅恪比外语,比西学?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一系列文章中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针对王国维投湖说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相比之下,在“知识短缺”之外,当下我辈所谓的教授还是思想的侏儒,以至于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匠”化。教师作为职业,是三百六十行内的“教书匠”。不知道哪一天,我会进一步变成“工具”?

十年间,发表有二十多篇与大学相关的文章。这里将论题相对集中的十篇合为一集。本书中各篇的主要内容除新写的《文科建制与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外,均先行发表过。因报刊的篇幅所限,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收入本书时,或恢复被删节的段落,或增补新的内容,或改正原来的错误,每一篇与原刊内容均有不同。同时也将文章的体例,特别是注释进行了统一的调整。

去年,王彬彬兄主持申报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获准,约我参与,因

此,我将本书列为此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

借这本选集出版,写下这些。

是为序。

沈卫威

2007年6月29日于南京大学

注 释

① 转引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第352—353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第2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③ 陈平原《大学何为》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目 录

自序	1
一个学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以《史地学报》为中心考察	1
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	
——以 1920 年代《国学丛刊》为中心考察	34
诚朴雄伟	
——百年大学的精神守望	60
文科建制与中文系的课程设置	
——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	84
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	
——从《国风》看中央大学的教授群体	109
现代大学中文系的知识体系与新文学的生存空间	
——以六所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为中心实证考察	140
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	
——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文人褻集雅聚	174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以文学院为中心考察	195

王国维的大学事功

——从北大到清华····· 207

大学之殇

——从梁济自沉到王国维投湖····· 238

一个学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以《史地学报》为中心考察

上 史实呈现

一 研究会的组织原则及刊物的出版

1921年11月,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辑的《史地学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创刊号作序的是柳诒徵(翼谋)。卷前有《本学报启事》,列有三项,说“本学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刊物,预定年出四期”。“本学报取公开的态度,极愿海内同志自由投稿,积极批评;其能以实地观察,或教授经验见赐者,尤为欢迎”。

《史地学报》创刊号本是1921年3月15日由史地学会决议出版发行的,7月第1号稿件编就,计划8月1日出版。后因商务印书馆印刷冗繁,直到11月1日才印出。刊物的封面署名“南高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号的出版时间为1922年2月,而版权页误印为4月。第3号为5月。预定年出4期的季刊,在实际的出版时间上有误差。第4号的出版时间为8月。第1卷共出4号(期)。

第2卷自1922年11月至1924年2月出版8期(号)。其出版时间分别为第1期1922年11月、第2期1923年1月1日、第3期1923年3月1日、第4期1923年5月1日、第5期1923年7月